

# 秦律中仁政利民政策研究

## ——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考察文本

兰 碧 仙

**摘 要:**《睡虎地秦墓竹简》写成于战国后期至秦始皇时代,虽远非秦律之全部,但透过该法律条文可看到秦国关于政治、经济等基本政策。秦国虽遵循法家的“重刑主义”,立法缜密、细致。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上看,秦律并非皆为苛法、暴政,《睡虎地》也体现了秦国的利民政策,甚至与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有共通之处。

**关键词:**《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仁政利民政策

**中图分类号:** K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11)6-252-03

**作 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集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福建,厦门,361005

### 一 实行时禁与薄税敛

实行时禁,自古以来有之。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秦律尚未发现“不违农时”的说法,不过孟子所提出的“时禁”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下文简称《睡虎地》)中亦有所反映,秦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麇卵鰕,毋□□□□□毒鱼鳖,置弃网,到七月而纵之。”(《秦律十八种》4-5)也就是说“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提取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sup>①</sup>先民在与自然的长期接触中,懂得了要遵循自然规律,按规律从事农事活动。秦律则将自发的尊重自然规律的行为变成强制性的行为,虽然主要动机是保护国家的苑囿,不过客观上保护了山泽的自然生长。而且秦律也有通融之处,如果有人死亡而需伐木制造棺槨的,可不受此律法的约束,即所谓“唯不幸死而伐棺槨者,是不用时”(《秦律十八种·田律》5)。

薄税敛是封建农业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仁政的重要内容。通过《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和《张家山汉墓简·田律》<sup>②</sup>的对比,可推知秦时的田赋税与汉初的大同小异。秦时不管田地有无开垦,田的征收标准是每顷3石,粟每顷2石,即所谓“入顷田粟,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田三石、粟二石”(《秦律十八种·田律》8)。而汉初时期“入顷田粟,顷入田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粟皆二石”(《张家山汉墓竹简》240),即田的征收标准是每顷3石,粟每顷2石,如果土地不好,田可少出1石。这样,秦与汉初贫瘠土地的田赋税就仅“一田”之

差。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而能延续秦的田赋税的标准,可见秦在这种税敛征收上并不是特别严苛。秦主张依法管理农业,《睡虎地》中的六条田律都是有关农业生产管理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维护农民利益的,比如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农具可向官府借用,如果借用农具是因破旧不堪而损坏的,只要写文书上报损耗即可,无需赔偿,“假铁器,销弊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秦律十八种·廩苑》15)。

### 二 提倡孝道 捍卫父权

孟子曰“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秦国受中原文化的浸染,律法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因素。秦国的家庭在长辈与晚辈之间也提倡“孝”道,维护父权。如果子不孝,则要受到严惩,或被放逐、被釜足,甚至被谒杀。秦简有一条关于年纪达到“免老”年龄的老人告儿子不孝,要求将儿子处死的案例“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法律答问》102)秦制有爵者年五十六,无爵者年六十,可以免除有关赋税、徭役,称为“免老”<sup>③</sup>“免老”有时难免昏晦,所以当它们提出诉讼时,一般要设立一定的限制条件,即采取“三环”的手续。目前只有《睡虎地》以及《张家山汉简》中出现“三环”一词,由于材料少,对它的解释有10种之多<sup>④</sup>。但不管是何种解释,“三环”程序肯定会延缓诉求时间。家长如果以“不孝”罪对子女提出诉讼时,程序上则无需“三环”,可见“孝”在秦律上有着绝对的优先权。

秦简还有一封关于“迁子”的爱书,记载的是某父亲谒请官府砍去不孝儿子的双足(或者在足部施加刑械<sup>⑤</sup>),把他放逐到边远的地方,让他终身不得回来“某里士伍甲告曰:谒釜亲子同里士伍丙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敢告。”(《封诊式》46-47)官府也完全按照父亲的意愿对儿子进行了惩办“告废丘主:士伍咸阳在某里曰丙,坐父甲谒釜其足迁,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论之,迁丙如甲告,以律包。”(《封诊式》47-48)官府对以不孝为名的案件都十分重视,而且对“不孝罪”如何制裁,秦并没有先制定统一标准,而主要依据家长的意志。与父母以“不孝”之名谒杀、谒釜足并流放其子形成对比的是,子女受父母伤害,法律却禁止告父母,“‘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非已行,它人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法律答问》104-105)也就是说秦律禁止子女告父母、奴婢告主。家主擅自杀死、刑伤、髡剃其子或奴婢,属于“非公室告”,不予受理。如果控告者坚持控告,控告者有罪;甚至控告者已经处罪

了,其他人接着控告,也不受理<sup>⑥</sup>。可见秦虽然倡导以“法”治国,但也强调“尊尊、亲亲”的社会秩序,这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家国一体的观念是一致的。推行孝道,维护父权的无条件性,是强调“君权至上”的思想在家庭伦理关系政策上的倾斜。以律法的形式强制人民要推行“孝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家长的权益。汉承秦制,对“不孝罪”的惩罚更为严厉。汉初律法明确禁止子女殴打、辱骂家长,否则就要处以“弃市”的极刑,即所谓“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二年律令·贼律》35)

### 三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秦律体现了对幼子生存权和奴隶生存权的保护。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秦律禁止老百姓擅自杀死子女、奴婢,更多的是为了保存劳动力,为国家创造财富,不过子女和奴婢的生存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保护。家长虽然可以“不孝”的罪名向官府请求惩办子女,但是这些案件都要经过审讯核实才能判决,不得擅自行动。《睡虎地》有一则父亲告子不孝的案例,“某里士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已往执。令史已爱书: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毋它坐罪。”(《封诊式》50-51)官府受理后,马上派令史去查明情况。经过司法部门的验问、查实,诚属“不孝”,才予以定罪量刑,并不完全依照父母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秦律明令禁止父母杀害健康子女。从《睡虎地》看,秦时奴婢分私家奴婢和官奴婢两种,奴婢对主人稍有忤逆,常被沦为城旦或黥刑,处境悲惨。但是主人也不可擅杀奴婢,否则要被定罪。因为《睡虎地》有对官奴婢“疾死”以及“非疾死”处理的相关条文“其小隶臣疾死者,告其□□之;其非疾死者,以其诊书告官论之”(《秦律十八种·廩苑律》16-17),官奴婢若非病死,须报官对责任人加以论处。

在《睡虎地》中有优养老幼弱人群的主张,对老幼弱人群的生活给予保护和优待。“孤寡穷困,老弱独传”(《为吏之道》二叁、三叁)和“老弱癯病,衣食饥寒”(《为吏之道》三〇叁、三一叁)者是秦吏在日常工作中应特别关注的。无偿给予没有劳动能力的老者、幼者口粮、衣物,如“隶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者,如春衣”(《秦律十八种·金布律》95);“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婴儿之无母者各半石;虽有母而与其母冗居公者,亦禀之,禾月半石”(《秦律十八种·仓律》50-51)。老者如果犯罪在服刑时也有一定的优待,如“杖城旦勿将司;其名将司者,将司之”(《秦律十八种·徭律》147),即老年的城旦一般不必监管,除非被特别指名要监管的,加以监管<sup>⑦</sup>。

从《睡虎地》看,法律为维护妇女的权益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如婚姻的结合或终止受法律保护。《睡虎地》有一则谈到婚后女子逃亡的问题,“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法律答问》166)逃亡的人妻要不要受罚?如果通过官府登记,婚姻被官方认可了,人妻就要受罚,如果未登记,就无需受罚。可见秦婚姻有私自结合和官府登记两种,通过官府登记的结成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法律的保护,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女方如果擅自解除婚姻得接受处罚。婚姻的终止也需要有正式的文书。战国时期终止婚姻关系主要是男方的主动行为,即“弃妻”,女子也可以逃亡的方式,终止婚姻关系,但是一旦被抓获,要受到惩罚。丈夫可以休妻,但这是基于报官的基础上

的,如果未报官就休妻,丈夫就要受罚,即所谓“弃妻不书,货二甲”(《法律答问》169)。可见不管婚姻的结合还是终止都需要官方承认,秦律将婚姻从民间默认转化为律法认可的形式,赋予婚姻一定的神圣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双方随意终止婚姻关系的行为。

秦律保护女方的私有财产。女性结婚时可从娘家那儿得到奁产陪嫁,这是女方的私有财产。《睡虎地》有两则谈到丈夫或妻子犯罪,女方私有财产的去向问题。“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法律答问》170),这一条谈到丈夫犯罪了,但是妻子如果先告发,妻子可不被连坐,丈夫的财产要被没收归公,妻子陪嫁的财产不被没收,仍归妻子所有。但是如果妻子犯罪了,她的陪嫁财产得给她丈夫,“妻有罪以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且异夫?异夫”(《法律答问》171),意思是“妻有罪被收,妻媵嫁的奴婢、衣物应没收,还是给其丈夫?给其丈夫。”<sup>⑧</sup>由这两起案例可推知,在秦国夫妻相互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财产独立性,各自有私有财产,以媵妾、衣器为代表的奁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基本上属于妇女。而且不管是妻子犯法还是丈夫犯法,她的私有财产都不被充公,都在家庭这一范畴中。妻子若因犯法财产所有权被迫转归丈夫所有,不过刑满之后,因为妻子的身份,可能还有享有这份财产的权力。妻子在家庭中拥有一定数量的独立财产,这就为妇女可能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荀子评价说秦人“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荀子·性恶》)。

### 四 对官吏的严苛和对特殊群体的相对宽松

《为吏之道》是供学习做吏的人使用的识字课本,但“有不少地方与《礼记》、《大戴礼记》、《说苑》等相同”<sup>⑨</sup>,如“以此为君则鬼(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能审行此,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君鬼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为吏之道》三八贰——四五贰),强调“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秩序以及作为“君臣父子”各自所应具有的基本品质。秦统治者对官吏的要求很高,这在《语书》和《为吏之道》上都有所体现。例如“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又廉洁敦悫而好佐上;以一曹事不足独治也,故有公心;又能自端也,而恶与人辨治,是以不争书。”(《语书》9-10)简而言之,秦官吏必须精通法律,能力强,具备廉洁、忠诚、老实、公正等基本品质。

秦对官吏的失职或职务犯罪的处罚是比较严厉的。对官吏严格管理,目的是加强其中央集权制。官吏失职所受的处罚据情节而定,较轻的一般是“谇”,即责骂。较重的则要按损失赔偿,追究责任。比如粮仓的管理,如果官吏管理粮仓不当,导致禾粟朽败,相关官吏要被训斥并赔偿,即所谓“仓漏朽禾粟,及积禾粟而败之,其不可食者不盈百石以下,谇官啬夫;百石以上到千石,货官啬夫一甲;过千石以上,货官啬夫二甲;令官啬夫、冗吏共偿败禾粟。”(《秦律十八种·效律》164-165)秦律严厉打击利用职务之便故意犯罪,“从简牍看来,法律对于盗罪的惩罚因所盗数目的不同而相异,对犯罪人的身份没有严格区别,法律对身份低贱的奴婢或私寇的惩罚基本与庶人一致,但却严厉打击官吏的盗窃。”<sup>⑩</sup>例如《睡虎地》规定:“害盗别微而盗,加罪之。”(《法律答问》2)“求盗盗,当刑为城旦,问罪当加如害盗不当?当”(《法律答问》3)。(下转47页)

动的贡献中,三区域的贡献度逐渐拉平。各区域间收入差距成为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因。

第三阶段(2005-2009年),这一阶段收入差距延续了大幅增长的态势,MLD指数上升了0.0143,与上一阶段比较来看,增长幅度有所扩大,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在区域内部、经济变动影响及区域间贡献度上,这一阶段与上阶段基本一致,区域间收入差距仍是造成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因素,其贡献度还上升了4.57%。

### 三 结 论

运用MLD指数分析区域收入差距问题可以说从方法上有改进,突破了以往只单一运用泰尔指数进行测度与分析,而且加入了MLD指数的动态分解,从而为跨期差距变动的原因探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该测度方法对1994-2009年湖南省14个市(州)及以湘东、湘中、湘西三区划分的湖南省区域收入差异程度及其变化态势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第一,在1994-2009年间,除1998、2004年外湖南省收入分配差异均呈扩大态势,在考察期间内MLD指数的增幅达40.71%,全省区域收入分配差异扩大明显。第二,在全部考察期间内,区域间收入差异贡献率由55%增至85.5%,区域间收入差距是影响湖南省区域收入差距的主导因素。这表明湘东、湘中、湘西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历来是湖南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原因,该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第三,在各区域内部差异的测度中,湘东、湘中与湘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在考察期间呈缓慢态势上升,其中湘西地区的内部差异最小;湘东地区内部差异其

次,而湘中地区内部差异最大,表明相邻同级区域的整体实力与趋同性对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作用。

以湖南省为例的中部区域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说明,要缩小湖南省乃至中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地区间收入分配差异,除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收入分配行为外,最根本的是要缩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缩小区域工业差距为主要切入点,促进东西之间的产业、产品、投资、人员往来和技术流动,推进东西经济互补的同时,增强经济的融合性,均衡各区域间收入分配水平。

### 参考文献:

- [1]刘永跃、周先华、毛云坚《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的区域收入差异预测和分析》,《价值工程》2007年第9期。
- [2]于成学《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泰尔指数多指标测度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09年第7期。
- [3]张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分析》,《前沿》2010年第15期。
- [4]陈国生、陈俊、陆利军《湖南区域经济差异的地区分解》,《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3卷第110期。
- [5]郑震《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测度研究》,《财务与金融》2010年第5期。
- [6]赵云凌、陈琳《基于BP神经网络的区域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统计观察》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余小平)

(上接253页)

可见官吏一旦利用职务之便犯罪,处罚时就要罪上加罪。

虽然秦法严苛,但以下几种情况,相关人员可免于连坐或受罚,体现秦律人性化的一面。“使诸侯、外臣邦,其邦徒及伪吏不来,弗坐。”(《法律答问》180)“邦徒”、“伪使”就是与使臣一起出使的本国随从和官吏,不是使臣自己的舍人。<sup>⑩</sup>如果他们出使别国后不回秦国,使臣无需连坐。年纪尚小的人犯罪可免于刑罚,如“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偿稼。”(《法律答问》158)此案例中的甲放牧一匹马,马被惊吓后,吃了别人的禾稼一石。但因甲年小,不但不会被论处,而且也不用赔偿损失。如果触犯刑律的当事人不知情,也可免于连坐。在秦律中有大量关于盗窃的案例,对偷盗的处罚很严厉。秦律主张严厉处罚“知而不报”的行为,但如果受牵连者不知情,就不处罚。如“甲盗不盈一钱,行乙室,乙弗觉,问乙论何也?勿论。其见知之而弗捕,当货一盾。”(《法律答问》10)乙不知甲偷盗,没有告发,属于不知情,因而也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关于“藏赃”也是分知情和不知情两种,如果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藏了偷盗者的赃物可以免于刑罚,如“夫盗千钱,妻所匿三百,何以论妻?妻知夫盗而匿之,当以三百论为盗;不知,为收。”(《法律答问》10)能区分故意犯法与过失犯法,显示出秦立法的高超,对过失犯罪不处罚或轻罚体现秦律立法的人性化。

从《睡虎地》可以看出,秦国虽遵循法家的“重刑主义”,但也实施了些利民政策。农业是关系社会民生的大问题,秦对

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的扶持,对某类税收(比如刍稿税)的征取也不是特别严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老、弱、幼、妇女、奴隶”等弱势群体也进行了一定的优待,这对体现了秦对本土“孝”文化的坚守。不过,相对于“重刑主义”的秦律,这些仁政利民政策微不足道。修建长城、阿房宫、秦始皇陵等耗费了大量的劳力,繁苛的法律使得老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沦为“城旦”、“城旦舂”,这也使得秦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秦的灭亡。

### 注:

- ①⑤⑥⑦⑧⑨⑩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39、118、54、134、280、136页。摘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篇目,略去书名,仅留篇名与简号,引文中出现的符号,“□”代表缺一字;“[ ]”表示根据上下文补足缺文。
- ②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 ③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词汇研究》,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 ④徐世虹《秦汉简牍中的不孝罪诉讼》,《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124-129页。
- ⑩文霞《秦汉奴婢盗窃罪释例》,《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8页。

(责任编辑:唐昌福)